

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明代重庆教育

李良品¹ 彭规荣

明代，是重庆地区在整个科举时代教育最发达的一个朝代。这一时期，学校类型最齐全，科举考试中，进士数最多。明代重庆“伟人才士接踵辈出”的发展动因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地方官吏的大力倡导；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重教勤学的历史传统；迁客骚人的文化影响；以及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这些事实表明，科举制度下的重庆教育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当时的政治，而且也与当地的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

表 1 重庆历代录用进士及比例(单位:人)

	唐	宋	元	明	清	合计
全国录用进士	6077	35612	1135	24877	26747	94448
重庆录用进士	3	277	15	442	199	935
占全国进士比例	0.5%	7.7%	13%	18%	7%	9.7%

一、学校教育勃兴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重庆教育勃兴的时期，当时重庆地区的学校有以下几类。

地方官学。按其性质划分，地方官学有儒学和社学两种。明太祖朱元璋早在立国之初，就深刻地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将发展教育事业置于十分显著的地位。于是，全国各府、州、县便纷纷设立学校，府学设教授 1 人，训导 4 人；州学设学正 1 人，训导 3 人；县学设教谕 1 人，训导 2 人。生员的名额规定为：府学 40 人，州学 30 人，县学 20 人。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强令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 年)夏四月，甲辰，设四川重庆卫酉阳宣抚司儒学。由是，重庆地区的官学(即儒学)勃兴。据不完全统计，明朝重庆范围内的儒学计有 30 处。其名称如下：重庆府儒学、夔州府儒学、巴县儒学、长寿县儒学、永川县儒学、璧山县儒学、荣昌县儒学、大足县儒学、茶江县儒学、南川县儒学、黔江县儒学、合州儒学、铜梁县儒学、忠州儒学、丰都县儒学、垫江县儒学、涪州儒学、彭水县儒学、酉阳司儒学、奉节县儒学、大宁县儒学、巫山县儒学、云阳县儒学、梁山县儒学、大昌县儒学、万县儒学、开县儒学、秀山县儒学、安居县儒学、江津县儒学。在重庆所有州县中，除大足、潼南、石柱三县未设儒学外，其余各州县均已设置。洪武八年(1375 年)，朱元璋因“乡社之民未睹教化”，于是又“诏天下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由此，重庆地区从府、州、县到广大乡村，均建立起学校教育网络。明代地方儒学，在教学上，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教习。除研习经史外，礼律合为一科，乐射合为一科，儒家的四书五经是生员的主要课程。校方规定，每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哺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表、碑、版、传、记之属”。生员在校必须遵守《学校卧碑禁例》，严加考课。考选的优秀生，进贡国子监，称贡生。其他人考中举人、进士后，即能入仕为官。地方社学相当于今天的乡村小学，按当时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可“送入读书”，既不参加入学考试，也无招生数额限制。全祖望在《结琦亭集外编·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中说：“乡里则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岸、术序之遗也。……一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千家文》为首，继以经史历算之属，守令亦稽其

¹作者简介：李良品，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彭规荣，涪陵师范学院副院长

所统弟子之数，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其秀才之优者贡之朝。”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的社学实质上是州、县儒学的预备学校。

地方书院。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由于明朝统治者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士人为获取功名利禄，纷纷趋向官学教育，书院受到冷落。纵观明代书院，其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过程。重庆地区书院的发展与全国基本相同，在宋代创建 11 所、元代创建 1 所的基础上，明代有一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重庆地区计有书院 20 所。它们是重庆府的凝道书院和来凤书院，巴县的云霞书院和来凤书院，江津县的栖清书院和梅溪书院，长寿县的凤山书院和香泉书院，合州的合宗书院，茶江县的文明书院，铜梁县的岳鹿书院，武隆县的白云书院，丰都县的平山书院和凌云书院，涪州的北岩书院，定远县的印山书院，忠州的集贤书院，夔州府的夔龙书院、少陵书院和仰高书院，开县的三贤书院。

私学。私学因其体制和经费来源渠道不同，而又名私塾和义学。私人设学叫私塾，与义学同为蒙学，专门招收 5 岁至 16 岁的儿童入学。私塾一般有散馆和专馆之分，散馆乃是明代重庆私塾的一般形式。义学是一种集体办学性质的基础教育，在明代私塾几乎遍及重庆城乡。

由于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办学，各府、州、县的儒学、书院、私塾均有长足的发展。正如《明史·选举志》所云：“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摩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随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此时的重庆与全国一样，学校教育高度发达，到处出现了“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科举才士辈出

明朝统治者广设地方学校，其目的在于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而学校培养的人才要成为明朝政府的官员，还必须经过人才的选拔。明朝选拔人才的制度除了荐举之外，主要的方法是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从政人才，而明太祖在诏书中明白宣示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就密切了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科举必由学校”。由此可见，只有接受学校教育并取得出身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这样，科举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学校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两者紧密结合，共同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在这种制度的驱动下，重庆地区的读书人拼命追逐，趋之若鹜，纷纷应考。有明一代，重庆人才辈出，进士数量为宋、清两代所不及。

表2 明代重庆各州县科举人才统计一览表(单位:人)

州县名	进士	武进士	举人	武举人	五贡	其它	合计	州县名	进士	武进士	举人	武举人	五贡	其它	合计
巴县	111		469		158		738	彭水县			10		57	1	68
江津县	36		168		177	10	391	黔江县			1		24		25
长寿县	34	1	110	1	66		212	酉阳司					4		4
永川县	16		72		16	3	107	秀山县							0
荣昌县	15		77		172	2	266	南川县		1	36	3	12	1	53
璧山县	6		26		168		200	万县	5		32		116		153
铜梁县	38		142		137	1	318	奉节县	6	1	41		269	1	318
潼南县	6		8				14	开县	1		19		97		117
合州	47		155	2	127		331	忠州	17		56		101		174
大足县	4		15				4	大宁监	1		11		84		96
璧山县	2		15	2	12		31	巫山县	5		25		219		249
涪州	34		175	1	97	5	312	梁山军	7		34	1	136	1	219
江北厅	16		27		4		47	云阳县	3		29	1	97		130
安居县	17		50		46		113	大昌县	1		5				6
垫江县	9		65		109		183								
丰都县	4		44		205	1	254								
石柱司			1				1	合计	442	3	1903	11	2710	26	5095

注:“五贡”指拔贡、优贡、副贡、岁贡、恩贡等生员;“其它”类包括孝廉、方正、副榜、荐辟等类人才。

资料来源于各府、州、县志刻本,现藏重庆市北碚图书馆“红楼”。

从上表中可见,明代重庆地区科举考试中贤良迭出,人才济济。特别是进士数量,几乎占明代四川全省 1368 名中的三分之一,在当时拥有进士人数前 15 名的州县中占 6 名。前 15 名依次为:巴县(111 人)、内江县(107 人)、富顺县(100 人)、南充县(76 人)、泸州(54 人)、成都县(107 人)、合州(47 人)、宜宾县(46 人)、铜梁县(38 人)、江津县(36 人)、涪州(34 人)、长寿县(34 人)、华阳县(29 人)、遂宁县(26 人)、嘉定州(26 人)。巴县,在宋代只出过 5 个进士,处于当时四川拥有进士数州县的落后位置上,而在明代一跃成为四川拥有进士数第 1 位的州县,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明代重庆科举取士数量的多寡,反映出当时重庆教育的几个特点一是整体较落后。虽然明代考中的进士数及其比例均为唐宋元清所不及,但其比例仅占全国的 18%,重庆教育的地位在全国仍十分低下,呈现出整体落后的态势。二是区域差异大。明代重庆府所辖州县居于教育发达地区。统计数字显示:重庆府占 442 名进士中的 391 名,占 1903 名举人中的 1530 名。夔州府所辖州县属次发达地区;酉阳土司与石柱土司所辖的五县属教育落后地区。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不发达。从统计表中可见,当时川东南五个少数民族聚居司县,在明朝 277 年中居然中进士数为零,举人仅有 12 名,秀山县一个都没有,石柱司也仅是零的突破,这一现象不得不让人深思。虽然永乐六年(1408)酉阳设立宣抚司学,但那毕竟是土司官及其子弟的学校,其他人无法就读。同时,“邵志秀山虽设为县,尚未立学,统入于州”。秀山县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20)”才“设专学”;而石柱“土司时厅地属夔州府,故学亦隶夔州府学……而试期赴夔,水程八百里,滩险路遥,诸生苦之……(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分学后改赴忠

棚考试……”。同时，有明一代，这五县之中书院尚未创设，教育落后必然导致科举人才罕见。

值得欣慰的是，重庆通过科举一途也产生了众多才华出众、品学超群的杰出人物。如吏部尚书蹇义、翰林院编修江渊、廉吏御史牟俸、翰林学士江朝宗、文学家贾元、贤良忠臣夏邦谟、著名哲学家邹智、易学大师来知德；在朝担任御史及尚书以上职务者有李实、喻茂坚、张佳胤、王应熊、喻思询、程源等数十位。明代重庆呈现出“家弦户诵，甲科炳焕”的状况。

三、教育与科举发展动因的历史考察

明朝重庆“科名雀起，人文蔚盛”，中举 1900 余人及荣登礼部州 440 余名、“文章功德彪炳人寰”，何也？

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地方教育。有教育史专家认为：明初教育事业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朱元璋一面重视兴办学校，一面急于开科取士。洪武三年（1370），他下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联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太祖“科举必由学校”之文教政策，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兴旺，人才培养的多少与优劣，与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否关系密切。

地方官吏的大力倡导。由于科举考中人数的多少是衡量地方官政绩好坏的一种标志，所以各级地方官都非常重视办学。明朝在重庆地区的诸多为官者之所以能声名烈烈，功德巍巍，是因为他们在大兴学校、大办教育方面有许多善举。今从《四川教育史稿》及《涪陵市志》中抄录诸例：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 年）知县田子真重修巴县儒学；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 年）知州赵友能重建合州儒学；明洪武四年（1371 年）知府盛南金重建夔州府儒学；明洪武七年（1374 年）知县郑凯重建巫山县儒学；明洪武十二年（1379 年）知县桂仲权于元代旧学址重建万县儒学；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沈定为涪州知州，兴学校，课农桑；明万历二十二年（巧 94 年），知州陈大道始创修学宫。他们对明代重庆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唐宋时代的西汉水（即嘉陵江）是潜转茶马、川米、布帛的重要潜道，合州为潜运转船之地，控扼整个四川的潜运，为“巴蜀要津”。有所谓“人生其间，多秀异而嘉，以诗书自乐”之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当时的渝州。有宋一代，合州考中进士 103 人，渝州仅 5 人，合州为渝州的 20 倍多。明代，随着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长江成为传输川米、马钢、蜀麻、蜀布、吴盐的重要水路，重庆经济地位迅速提升。它不仅成为几条潜运通道的汇合点，形成“二江商贩，舟揖傍午”的繁荣景象，而且北方和川西的众多大族流寓于此，人口发展加快，人口密度增大，“兴学养士”之风形成。巴县出现了“有明三百年邑中膺乡荐者四百余人，登礼部者百余人”的“人文蔚盛”的可喜局面。明代，夔州府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教育发展十分迅猛。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夔州府仅出进士 21 人，而明代涌现进士 29 人，举人 194 人、五贡 1018 人。在这片地僻民贫的土地上，英才辈出，其政治经济重心转移的作用不可低估。

重教勤学的历史传统。重庆地区办学的历史悠久。据《华阳国志》载：“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遣张叔、司马相如诣京师受业，还教乡里，巴郡亦立文学。”又据徐中粹《夔州府重建州学记》载：“夔州府学建于宋庆历兴学时期（1004 年）。”《四川通志》云：“夔州西南之陋，当天下学者盒然响劝之时，此邦之人，尚不识书生。庆历诏郡县立学……于是人渐知读书”。到治平三年（1066 年）时，夔州“郡之人喜闻乐从，奔走入学，惟恐后时……四远之人，执业而就学者，交足在境”。明代时，绝大多数州县均立儒学、书院，私塾更是遍布城乡。重教勤学的传统，使重庆地区“少文学”的面貌得以改变，使“士愿而好学”习俗得以传承与发扬。重庆籍人创办书院不乏其例。弘治初年（1488 年）丰都县人杨孟瑛创建平山书院；弘治十二年（1499 年）户部给事中刘秋佩辞官回乡后在武隆县高埂白云关佛寺创办白云书院。至于明代自行设馆，招收学童之私塾师，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对重庆人“向学”风气的形成、教育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功不可灭。

迁客骚人的文化影响。唐宋时期，封建统治者视重庆地区为边睡蛮荒之地。因此，渝州、涪州、黔州、忠州、夔州等地均是朝官贬谪、流放之所。这一时期，大量的文人骚客或为官于此，或滞留于此，或流寓于此，从而对重庆教育产生深刻影响。

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植、刘禹锡、李商隐，宋代大诗人苏询、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十朋等，他们都曾到过重庆。面对重庆地区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们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这为后来明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宋代一些理学大师相继在临重庆地区，或创办学校，或聚徒讲学，使后学辈出，代代相袭，为明代重庆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这里的交通条件包括软条件和硬条件。软条件如宋、元之后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改变了长江川江段的交通地位。硬件条件如元代开通了四川释道的东大道，有利于重庆 11 个州县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发达的交通必然促进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繁荣也必然要促进教育的迅速发展，也为文化发展和名人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重庆历来占“控两江之会，漕二川之粟”之地利，重要的交通地位及发达的交通运输促进了商贸的发展，明代的重庆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水牵运转，万里贸迁”。有明一代的科举进士数由宋代的 5 人猛增至 111 人，居全川之首，这绝非偶然。涪州依托其“会川蜀之众汇，控瞿塘之上流”的特殊地理环境，交通发达，商贸繁荣，为明代川东经济中心。涪州“文风齐两蜀”、“文治蒸蒸，比于齐鲁”。科举场上英才辈出，累计达 300 余人。处在四川释道东路一线上的各州县，其中进士数也远超邻近的州县。如荣昌 15 人、永川 16 人、璧山 2 人、巴县 111 人、长寿 34 人、垫江 9 人、梁山 7 人、万县 5 人、云阳 3 人、奉节 6 人、巫山 5 人，共计 213 人，几乎占重庆 31 个州县进士总数的一半。

无可否认，科举制度的产生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然而，笔者对以上众多的事实进行理性的分析及历史的考察后认为：明朝重庆科举考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不仅受制于当时科举考试的实施与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还与重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 [1]. 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
- [2]. (清)张晋生等：《四川通志》，见四库全书(卷 559)，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3]. 熊明安等：《四川教育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 [4].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 2001 年版。
- [5]. 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6]. 吕绍衣：《同治重修涪州志(序)》，巴蜀书社 1995 年版。
- [7]. (民国)向楚：《巴县志(卷八，选举志)》。
- [8]. 王煌：《江津县志(选举志)》，(清)光绪元年(1875 年)刻本。
- [9]. (民国)《长寿县志(选举志)》。
- [10]. 许增荫：《永川县志(选举志)》，(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 [11]. 施学煌：《荣昌县志(选举志)》，(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再增刻本。

-
- [12]. 郑贤书等：《民国新修合川县志(选举志)》，民国十年(1921 年)刻本。
- [13]. 王盆清等：《涪陵县续修涪州志(选举志)》，民国十七年(1928 年)铅印本。
- [14]. 谢必铿：《垫江县志(选举志)》，(清)光绪二十六年(19 刃年)刻本。
- [15]. 黄光辉等：《重修丰都县志(选举志)》，民国十六年(1927 年)铅印本。
- [16]. 王槐龄：《补辑石石主厅新志(选举志)》，(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刻本。
- [17]. 王鳞飞等：《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选举志)》，同治二年(1563 年)刻本。
- [18]. 黄际飞等：《南川县志(选举志)》，(清)光绪二年(1576 年)刻本。
- [19]. 恩成：《夔州府志(选举志)》，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补刻本。
- [20]. 吴友魏：《忠州直隶州志(选举志)》，清道光六年(1526 年)刻本。
- [21]. 李友梁等：《巫山县志(选举志)》，巫山县志编幕委员会 1988 年重印本。
- [22]. 朱言诗等：《梁山县志(选举志)》，(清)光绪二十年(15 弘年)刻本。
- [23].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24]. 柯仲生：《彭水概况》，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彭水县政府铅印本。
- [25]. 薛新力：《重庆文化史》，重庆出版社 2001 年版。
- [26]. 涪陵市志编幕委员会：《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27]. 常壕、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1984 年版。